

# 再谈大学学报的使命

## ——纪念《武汉大学学报》创刊 80 周年

刘 道 玉

关于大学学报的使命,自大学学报诞生起,不少学者和办刊专家都有不少论述,可以说已是一个基本获得共识的问题。2004 年 6 月 29 日,我在湖北省期刊学会成立 20 周年的大会上就学术期刊的使命也作了一个发言。其中,我谈到:“作为学术期刊,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宣传科学、传播真理的伟大使命,同时还要肩负起学术打假的任务。”自那次讲话以后,我仍不断地在思考学报的使命问题,似觉得意犹未尽,本文想就这个问题,再发表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期望引起学术界的同仁们讨论。

一般认为,1906 年创办的《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学报,诚如其《发刊词》所言:“谋刊行月,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1919 年 1 月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无疑是更具有连续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解放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主持通过的《关于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大学学报的使命是:(1)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辩,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2)《北京大学学报》以刊载本校教师和科研工作人员的创造性的学术论文为主,必要时亦可选载有关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

《武汉大学学报》是 1930 年 1 月创刊的,其历史要比全国最早的学报稍晚了一点儿,但亦属我国正式出版最早的学报之一,其办刊的宗旨和任务,除了沿袭各大学学报的传统作法以外,是有其自己的鲜明特点的。这些特点反映在王世杰校长决定创办《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王世杰校长在其亲自撰写的《创刊弁言》中着重强调了办好刊物的三点要义:一是质量,认为“学术期刊可以看作一国文化质量的测验器”;二是认为促进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是“鉴赏与批评”;三是他要求把学报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仅本校同仁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不惜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

解放前,我国大学总数只有 66 所,其中公办大学 39 所,私立和教会大学 27 所,从办学体制上说,基本上是一个合理的结构。在这些大学中,能够办学报者也只有少数的国立大学,所以学报的质量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可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今非昔比,现在各类大学总数已达 2286 所,而大学学报也有 2000 多种,基本上是每校都有学报。因此,在当前再谈学报的使命,重新认识大学学报的性质、任务和如何办好学报,确实有其必要。

顾名思义,学报是学校的学术刊物。从大学学报诞生至今,基本上贯穿了两个办报的原则:一是反映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刊载本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成果。这两点可以堪为是“铁的规定”,少有人提出异议,更无人敢于突破这些规范的做法,反正年复一年地办下去。

问题不在于是否坚持这两个原则,而是如何理解和辩证地执行这两个原则的问题。要办好学报,必须正确地理解什么是学术?对于在大学和学术研究单位工作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了它的真谛。汉语“学术”一词,在我国早已有之,由于汉语多音多义

的特点,学术是由“学”与“术”二字组合的,分别代表两个层面的意思。“学”是指系统而专深的知识,它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术”是指技术,回答的是“怎么样”和“有什么用”的问题。由此使我想到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Peter Gruss)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定问题。德国有两个最大的学会,一所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 70 多个研究所,以注重基础研究而著称;另一个是夫朗和费协会,下属 38 个研究所,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对于这两个学会的区别,格鲁斯精辟地界定说:“夫朗和费协会是在现存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则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这是我迄今看到的区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最简明和最深刻的见解,同时也回答了究竟什么是学术的问题。依照格鲁斯的观点,所谓学术就是系统的知识,是基础理论知识,是创造出来的新知识。

“学术”一词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科学概念,不仅有着明确的界定,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我认为,凡是称为学术的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纯理论的特点,远离实用和技术。如《剑桥国际英语辞典》对“学术”的解释:“学术”是“与学校、学院、大学有关的,或者与研究 and 思考有联系的,但与使用技能无关。”它的英文原意为:relating to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connected with studying and thinking, not with practical skills。这个解释丝毫不是轻视技术的作用,只是明确地区别学术与应用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实际上,学术与大学的功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第一个回答大学是干什么的,他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既然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那么,大学要在“授业”的同时又必须从事学术研究。然而在现阶段,我国不少重点大学没有肩负起研究高深学问的任务,尚缺少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换言之,我国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上,有不少大学在进行着“学术自杀”!

二是发展学术的三原则。美国既是拥有最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国,又是科技发明的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学术自由政策不无关系。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源远流长,1915 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签署的宣言中肯定了三 A 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这就奠定了学术自由的基础。这三项原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基石,也是繁荣学术的重要政策,更是导致大批发明创造的“酵母素”和“催化剂”。

三是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造。一般来说,学术可以分为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和学术应用。从学术研究来说,创造是其最本质的特征。所谓创造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以追求新发现、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为目的,而这些也正是学术的最根本的特征。作为大学的学术刊物,应当反映这些创造成果的新内容,要拒绝任何模仿、重复、辑录和对个人讲话注释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是与大学学报的学术宗旨相悖的。

怎样才能进行学术研究?学报应当反映什么样的学术论著?为此,我想到了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一本书,它的中文名字是《学术与政治》,其中收录了他于 1917 年 11 月在慕尼黑发表的两篇演讲稿:《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不妨读一读《以学术为志业》这篇演讲稿,对于我们理解什么是学术及如何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都是大有裨益的。用他的话来说,做学术研究的应当是这样的人:“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

无论是古今中外,一切大学问家从事学术研究,都是讲究境界的,不入境是难以在学术研究中做出重大建树的。我国晚清学者王国维,自幼聪慧过人,但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却中途离场弃考,后来却成为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在《人间词话》一书中,提出了“人生三境界论”,对我国近现代学者治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他说:“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王国维巧妙地把三首宋词中的三个佳句比喻为三种境界:第一境如晏殊《蝶恋花》中所形容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独居象牙之塔,自甘清苦、寂寞的精神;第二境如柳永《蝶恋花》中所形容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废寝忘食的精神,为了学术事业而变得消瘦憔悴而不悔;第三境

如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所形容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执著地求索的精神,心有灵犀一点通,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境界,曹雪芹怎么能够忍受着饥饿和丧子之痛,在北京西山乡村隐居,用15年写出了历经200多年而经久不衰的古典文学第一名著《红楼梦》?俄罗斯天才数学家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贫居陋室,如果不埋头潜心,仅仅靠母亲30美元的退休金生活,怎么能够证明“庞加莱猜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如果不在普林斯顿大学隐身7年,又怎么能够证明“费马大定理”——一个困扰了世界数学界358年未被证明的数学猜想?

我国近代天才学者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用了20年时间,完成了《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总共百万字,全部由他口授、助手笔录而成,包括注释文献几百种,创造了我国学术史上的奇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无不为之感动,他甚至感叹道:“要用举国之力,来和陈先生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体现的也是一种境界:献身学术的精神。一个学者唯有发自内心的对学术献身,才能提升其人格的高贵和尊严的境界。

可是,这种做学问的境界现在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学术浮躁和浮夸,甚至各个大学都出现了个别的剽窃和抄袭现象。就我国大学学报的现状而言,虽然大学学报的数量、期刊版本、装帧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进,这些都是今非昔比的。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大学学报的学术质量并不高,缺乏独创性的学术论著,学术争鸣也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这些都尚有待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呢?最重要的是要使学报回归到学术本源上,反对“天下文章一大抄”的恶习,反对求量不求质的偏向,反对一切向钱看的庸俗思想。

同时,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来自于高素质学者的研究成果,它们犹如“源”与“流”的关系,唯有创新的“源头活水”,大学学报才会有生命力。否则,即使拥有再强的专门编辑力量,那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培养一支富有创造精神的教师队伍,扎扎实实地、心无旁骛地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培育严谨、求是的学风,是办好大学学报的关键之所在。

在纪念《武汉大学学报》创刊8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王世杰校长在《创刊弁言》中提出的目标,即把学报办成“全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不仅本校同仁能利用其篇幅以为相互讲学之资,即校外学者亦可借以其学术文字,惠此诸刊。”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达到了这个要求,应当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试问:今日我国有哪一个大学的学报敢说自己是“全体学术界之公共刊物”?依我看,大多数大学的学报还是“同仁”刊物。我偶尔也浏览一些大学的学报,大约80%以上的文章都是本校教师的文章,有时也有几篇校外的稿子,但都不是重点文稿,仅仅是装饰门面而已。而且,这种情况在我国重点大学的学报中尤为突出,因为他们似乎觉得普通大学教师的文章不入流。其实,这种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学报应当引入竞争机制,重点大学学报之间要互相交流,不慕名校(或名人)要慕名文。要善于发现那些确有真知灼见的“小人物”的学术著作,要敢于发表那些有歧见的学术论著,大力开展学术争鸣,敢于标新立异,因为推动新学术发展和创建新学派毕竟是我国重点大学及其学报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

编后:《武汉大学学报》是我国出版最早的学报之一,在我国学报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以1930年1月正式创办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为始的《武汉大学学报》,至今已走过了近80年的历程。探寻《武汉大学学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足迹,总结《武汉大学学报》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展望《武汉大学学报》的未来发展,对于办好今天的《武汉大学学报》,繁荣武汉大学的学术事业、促进武汉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本期起陆续以特稿形式发表文章以纪念之。